

上海滩的“双簧兄弟”

——赵超构与张乐平的神交往事

◎ 两浙人物 □ 富晓春

今年是我国杰出新闻工作者、著名杂文家赵超构和当代杰出漫画大家张乐平逝世30周年。赵超构，笔名林放，60年间手不停笔，写作杂文万余篇，创立“林放式杂文”。他写的“未晚谈”跨越两个时代，是中国时间最久最有影响力的个人专栏。张乐平，原名张升，60年间以画三毛名闻天下，三毛陪伴几代国人成长，三毛的银幕形象可与卓别林《寻子遇仙记》相媲美。他们均生于1910年，逝世于1992年，赵超构生辰早半年有余，张乐平迟7个月逝世。他俩有太多的相同之处：同庚，同寿，同为浙江老乡（文成、海盐），同为上海文化界名人，生活中同好一杯酒。他们情深意笃，经常诗唱唱和，珠联璧合，还联手创办漫画刊物，堪称闯荡上海滩的“双簧兄弟”。

同一战壕战友

1992年2月，上海街头寒气逼人，人行道两旁梧桐树上金灿灿的叶子已落尽，只剩下毛刺刺的小果挂在枝头。赵超构和张乐平两位步入垂暮之年的老友，像是冥冥之中命中注定似的，竟然一同病危，一同住进了华东医院。病房相隔不远，可他们再也见不了面，只能在心里互相牵挂。张乐平问家人：“赵超构怎么样？”在另一间病房里，赵超构浑身插满管子，呼吸困难，他也在询问：“张……乐平，怎么样？”

据说，赵超构还写了一张问候的便条转交给张乐平。这一次，赵超构再也没能从医院出来。他抛下老友，在一个静默的夜晚先走了。张乐平还在病床上抢救，浑然不知。当他病情趋缓，得知老友赵超构走了，悲痛欲绝。家人告诉他，已派出代表替他前往送别，使他稍微感到一些安慰。7个月以后，他也追随赵超构而去。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聚，那里没有病痛。

他们生前两人见面，放言无惮，无话不谈，彼此争抢以老兄长自居。他们结识于20世纪40年代白色恐怖之下的旧上海。张乐平笔下寥寥数笔，蒜头鼻子细脖子，头顶三根孤零零头发 的三毛形象深入人心；赵超构的《延安一月》，还有以“沙”为笔名短小精悍的小杂文家喻户晓。两人虽未见面交往，却早已互为钦佩成为神交。张乐平一直是《新民报》主要的漫画作者。

杂文与漫画，可谓是孪生兄弟，都被称为匕首和投枪。杂文家与漫画家更像是“同一战壕的战友”，攻守相应，都在用手中的笔挥洒针砭风颂的笔墨。1946年，赵超构从重庆返沪创办《新民报》晚刊，张乐平、丁聪、张文元、沈同衡、特伟等漫画家积极配合报纸上的新闻作画，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嘴脸。

“漫画无虚日”，一直是《新民报》的特色之一。1949年以后，《新民报》继续发挥传统优势，突出杂文与漫画的宣传，开设了《漫画选》以及类似于新闻漫画的《蔷薇花下》等栏目，一时成为上海漫画家的乐园。这与赵超构和张乐平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在中国杂文界，张乐平最推崇的是林放的“未晚谈”。他长年阅读《新民晚报》，拿到报纸首先翻看“夜光杯”副刊，看老朋友赵超构发表的家长短和时政宏论。如果哪一天，或者隔了几天，没有看到“未晚谈”，他心里像是丢了什么似的，没有着落；甚至还会打电话给赵超构，一方面是担心老友境况，另一方面还真是放不下“未晚谈”。

在中国漫画界，赵超构最推崇的漫画形象是三毛。看着三毛光溜溜的脑袋壳，那三根粗壮的头发，就欢喜得不得了。赵家每个家庭成员都喜欢三毛，拿到一本三毛漫画，不分大小孩竞相抢阅，先睹为快。1979年春，赵超构在《三毛物解放》再版序中写道：“一个艺术家创造的人物，能够得到这么广大群众的欢喜，而且又能经历这么长时间的考验，得到祖孙三代人的欢迎和同情，这就不仅仅是因为造型艺术的成功，而且毫无疑问，一定是因为作者在三毛身上，凝聚、倾注着那种经得起考验的真实性和人民性。”

诗画“演双簧”

1978年11月，张乐平生病出院后，赵超构



张乐平(左)与赵超构

专门写信慰问：“乐平同志；又是月余未见了。最近，才知道你在庐山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，而且进了医院。这一方面是积劳成疾，同时也可见吾辈老头子抵抗力之弱，经不起气候变化的考验。现在，我猜想你一定已出院，在家休养了吧？古人说，‘因病得闲殊不恶，安心是药无妙方’。希望你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养息，业务应该暂时挂起。上次咱俩的‘双簧’，听说反应还过得去，当天报纸也很快就卖光了。这首先是‘三毛’作者的号召力，无需否认的。本应赴府问候，最近连开十天多的民盟工作会议，只能修函问好，改日再畅谈吧。”

信中提到的“双簧”，即指他们发表在同年10月15日《解放日报》第四版“朝花”副刊上的诗文配画《延安——西安之旅》。是年秋天，他们随同上海市政协参观团访问延安、西安，游览兵马俑、黄帝陵墓、半坡村等名胜古迹，瞻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的旧居，以及其他革命文物遗迹。1944年5月，赵超构曾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访问西安与延安，写出了媲美爱德加·斯诺《西行漫记》的《延安一月》。故地重游的赵超构诗兴大发，共写下六首诗，还配了说明文。同行的张乐平亦兴致高涨，用那支画三毛的如椽之笔，共画了九幅速写。一诗一画，一文一题，相得益彰。

与画家、漫画家诗文配画，可谓《新民报》的又一大特色，也是赵超构的保留节目。早在五六十年代，他与漫画家张乐平、乐小英，还有画牛出名的画家汪观清等，经常合作在报上发表诗配画，或文配画。1959年3月初，他与乐小英到上海郊县采访，发表散文《春郊行脚》一组12篇，图文并茂，意趣盎然。赵超构用“柳拂云”或“林圃”笔名，故而鲜有人知。

赵超构与张乐平的合作最为默契，可谓天衣无缝，他俩私底下戏称“演双簧”。两人文画对时，一唱一和，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，使得原本平实的版面，平添几分意趣与新奇。对于信中提及的这次“演双簧”，赵超构显然很满意，对老搭档张乐平赞赏有加。他在信中说：“听说反应还过得去，当天报纸也很快就卖光了。这首先是‘三毛’作者的号召力，无需否认的。”

他们这一生“演”得最大、最成功的双簧还在后头呢。

创办《漫画世界》

1985年《新民晚报》第一个子报《漫画世界》创刊。“三毛之父”张乐平出任主编。赵超构作为发起人，共同拟定办刊宗旨，为其摇旗呐喊。他在以个人名义撰写的创刊词——《致〈漫画世界〉的读者同志》中写道：“漫画，在画坛里虽然只是小家小户，但是作为百分之百的争鸣作用，是不能低估的。《漫画世界》就是国内的一批漫画工作者出于同气相求，聚在一起，根据上面说的旨趣，适合当前的时代步伐，诚实地为读者服务，并且诚恳地期待着在读者中求得众多的知音者。”

第二封“先生等主持正义，肝胆照人，素荷厚爱”，6月9日第三封“以先生等平素关爱之深，想决不厌其烦读也”，6月17日第四封“顷如兼来苏，传达尊处所得消息，斡旋之劳，益增铭感”。二是明确提出爱国无罪。如第二封“钧儒等以和平奋斗之手段，为抗日救亡之呼吁，冤被羁押，迄今已六月……但自问无罪，天下亦尽知其无罪，为国家民族前途计，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其永留于史册”“钧儒等秉爱国之热忱，竟被处害国之罪刑，闻之深滋悲痛”，第三封“钧儒等对本案态度，始终坚守不妨碍救国运动及不侮辱个人人格之原则，为救国无罪而努力，诚以个人受屈事小，国家前途及民族气节事大也”，第四封“对于经过反省院一点，钧等认为于国家前途无益，于个人人格有损，万难接受，不得不暂死力争”，均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，在事关国家救亡图存方面，沈钧儒不以个人安危为计，观点毫不含糊。三是提出事件解决方案。如第一封“窃钧等事之解决途径，不外乎法律程序与政治救济”，第三封“切盼先生等立即设法延迟判决，一面再为筹更

这缘起于他们在30年前许下的一个未曾实现的约定。50年代初，上海杂文与漫画创作空前活跃。上海是现代中国漫画的发源地，早在30年代就出现了《时代漫画》《上海漫画》等刊物。解放后第一本《漫画》月刊也是在上海诞生的，只可惜5年后就迁到北京出版。赵超构、张乐平认为，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，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漫画刊物。

有一次，漫画家、《新民晚报》美术组组长乐小英，请他俩还有张林岚到家里小酌，大家酒酣耳热，便萌生了合作兴办漫画刊物的想法。当时张乐平还在《解放日报》当美术编辑，赵超构有意“挖”他到《新民报》当编委，两人雄心勃勃，摩拳擦掌，想大干一场。可好事多磨，稍后由于“反右”运动开始，形势骤然变化，此事被迫搁置。

岁月流逝，时光进入1985年的夏天。历史的再现竟然那样相似。也是在上海，有三位被人们称作“美影三剑客”的中年漫画家阿达（徐景达）、詹同（詹同道）、王往（王树忱），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、共同的理想，也像当年的赵超构和张乐平一样，正在筹划创办一本漫画刊物。他们的倡议，得到了单位领导——一位30年代的老漫画家特伟的鼎力支持，但由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“一时找不到能够提供印刷出版和发行等条件的合作者”而举步维艰。

当赵超构和张乐平获悉此事时，两位老友又旧话重提，仿佛从他们身上，又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。尽管当时的《新民晚报》刚复刊不久，自身还存在着诸多困难，但赵超构还是爽快地应允了下来。他说：“《新民晚报》在解放前就天天登漫画，有许多漫画家朋友。1957年后漫画少了，现在漫画创作有了宽松的环境，将会繁荣起来。我们这个画刊出得是时候了。”

《漫画世界》刊登漫画的同时也登杂文、打油诗、笑话、小品文等。编辑部就在报社总机房边上，一个三平方米的小间里，只能摆放两张桌子，坐一个人。当时停薪留职在家画漫画的小青年郑辛遥，成了编辑部唯一的专职编辑。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编辑部，却有着阵营强大的组委：张乐平、特伟担任正副主编，阿达、王往、詹同、叶岗、田遨、徐克仁、郑辛遥、杜建国等担任编委，报社还指派张林岚为常务副主编，主持日常编务。

有了《漫画世界》，赵超构跟漫画界愈加走近。他亲自捉笔写有关漫画的文章——画刊创刊短短一个月，就连写了三篇，他说，“政界人物对待漫画的揶揄和讽刺，采取多大的宽容度”“是跟社会民主的风气成比例的”。因此，他倡议，把名人画入漫画，特别是为政界的领袖画漫画，以培养社会上的民主气度和幽默感。

远在北京的华君武、丁聪等名家，成了画刊编外的领衔主角。赵超构与张乐平几乎每年都要邀请他们来一次上海，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上海漫坛重大的活动场合上。赵超构也喜欢与漫画界的朋友打交道。他从画刊上拿到稿费，就请编委会和那帮年轻的漫画家“打牙祭”。

赵超构给杜月笙的四封信都不长，但言简意赅，说事情有理有据，很有说服力。杜月笙对沈钧儒在信中提出的要求，也以实际行动给予回应，对于缓和事件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。在沈钧儒给杜月笙写完四封信的次月便发生了“七七事变”，后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沈钧儒等“七君子”。沈钧儒等能够顺利摆脱牢狱之灾，虽然原因复杂，但杜月笙前期的从中努力斡旋应该功不可没。

◎ 史林偶拾

联大教授不介意不生气

□唐宝民

汪曾祺回忆说：“联大教授之间，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。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。但有时放言且日，也无所谓。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，就评论过两位教授，说一个‘集穿凿附会之大成’、一个‘集啰嗦之大成’。他也不考虑有人会去‘传小话’，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。”

唐立庵先生之所以敢于当众评论另两位教授，是因为他知道另两位教授都是心胸宽广之人，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计较，所以才敢放言无忌。那两位教授果然也没有对唐立庵表示不满，三位当事人日后依然相处得很融洽。

对于来自同事的评论不介意，已经很难

得了；但对于来自学生的讽刺也不生气，就更难能可贵了。再来看一段汪曾祺先生的回忆：“当时有一个‘冬青社’，颇有影响。冬青社办了两块壁报，一块是《冬青诗刊》，一块就叫《冬青》，是刊载杂文和漫画的。冯友兰先生、查良钊先生、马约翰先生，都曾经被画进漫画。冯先生、查先生、马先生看了，也并不生气。”

学生们用漫画的形式讽刺老师，这些老师却不生气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拥有宽广的胸怀；另一方面，是因为这些教授骨子里拥有着自由的理念，认为学生画漫画讽刺老师是学生们的自由，老师们没有干涉的权利。这样一想，心态也就平衡了。

总而言之，联大的大多数教授都是拥有包容理念，所以才能不介意、不生气。这种人处世的态度，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典范。

一幅创作了37年的油画

□张达明

吴冠中先生有一幅题为《修女》的油画。这幅名画完成于1987年，灵感则来自于1950年。也就是说，《修女》画了37年。

1950年，吴冠中在法国留学3年后坐船回国，行驶到地中海时，他忽然发现在靠近窗户的一张桌子上，有两位身着黑色衣袍的漂亮修女，悠闲地一边喝着饮料，一边欣赏着窗外的海景，从她们的眼神里，看不到半点的忧愁和伤感。吴冠中被眼前的这一幕深深感染，他决定将这个构图画下来，便以艺术家的身份，征得了两位修女的同意，然后拿起笔，画了一幅素描，计划回国后在这个基础上画一幅油画。

回国后，因种种原因将这一创作计划搁置下来。直到吴冠中在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的1987年，才又翻出了那幅素描，重新开始

名家为何毁稿

□颜士州

一个作家呕心沥血写出一部作品来，却又亲手把它毁掉，岂不是咄咄怪事？然而，这类“怪事”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。

晋代史学家夏侯湛经过多年惨淡经营，终于撰写出前朝史书《魏书》初稿。当他得知同时代人陈寿也写出前朝史书《三国志》后，急忙找来阅读。他读后深感自己的《魏书》不如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写得好，于是当即把《魏书》焚毁。

唐代大诗人李白年轻时模仿《文选》中的佳篇，仿写了好多文赋，但自己读来读去，总觉得不如原作精彩，便将这些作品付之一

炬。据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他“拟作三次，焚稿三遭”。

据《却扫编》记载，王安石曾写过一篇《兵论》。有一天，刘贡父无意翻阅之后，再与王安石交谈时候，故意当作自己的近作，向王安石讲述一遍《兵论》的内容。王安石不知道刘贡父已经看过他的新著，以为自己步了别人后尘，便当着对方的面把这本甚有见解的《兵论》毁弃。

上述毁稿行为并非都值得效法，但名人们知己不足、耻于雷同、但求出新，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十分可贵，值得我们学习。

第五伦坦承“私心”

□刘跃

第五伦复姓第五，名伦，是东汉初年有名的大臣，为官清廉，知人善举。

第五伦一心奉公，上书论说政事从不违心阿附。他的儿子们经常劝他不要这样，他都予以训斥赶走。有人问第五伦说：“您有过私心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先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，我虽然没有接受，但后来每逢三公选拔举荐官员时，我内心总会想起他来，然而最终也没有重用他。我的侄子经常生病，

我一晚上去看他10次，回来后安然睡眠；可是我儿子生病的时候，我虽然不去看望探视却整夜不能入睡。像这样的人，难道可以说没有私心吗？”

平心而论，第五伦所讲的“私心”乃是人之常情，但他却严以律己，不愿以“无私”自诩，颇有自责之意，恰恰衬托出他的真正无私。心底无私天地宽，第五伦正是因为心底无私，所以才如此坦荡地回答他人的质问，敢于真实地剖析自我。

◎老照片

每一幅照片背后，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，都有一段历史



山光水色，相映成趣

南雁荡山位于我省平阳县西部，北距温州市区87公里。南雁荡山以山得势，因水成景，山因水活，水随山转，山光水色，相映成趣，以秀溪、幽洞、奇峰、景岩、银瀑、石壁等自然风光闻名遐迩。改革开放后，我省各地纷纷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，南雁荡山因此成为我省浙南地区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。图为1982年游客在南雁荡山游览。

照片拍摄者：徐永辉

◎ 史海钩沉 □ 刘晓东

沈钧儒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，杜月笙则是上海滩重量级的帮会大佬，看起来两人似乎不会有交集，但风云际会，因为“七君子事件”两人有了书信往来，沈钧儒等得以释放也有杜月笙的一分努力。

1936年11月23日，南京国民政府以“危害民国”罪，在上海将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史良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沙千里等七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逮捕并投入监狱，这便是震惊中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事件发生后，在苏州狱中的沈钧儒先后于1937年5月25日、6月1日、6月9日、6月17日给杜月笙连续写了四封信，每封信虽均不长，但情真意切而又义正辞严，不愧为“君子”之言。

四封信主题比较明确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方面内容。一是表达对杜月笙从中斡旋的感激。如1937年5月25日第一封信写到“先生等斡旋及照拂之盛情，无任铭感”“种种费神，不胜感激”，6月1日